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说明货币政策进入全面宽松通道,不会对证券、房地产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市场会根据此前的通道运作。

央行“货币鸡汤”旨在经济维稳

2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将自24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三个月来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下调,下调的频率低于市场预期,且不动用利率手段,说明数量调控依然是货币政策的首选。

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实体经济有下行趋势,全国房地产价格环比全面下降,钢铁、机械、汽车等重要行业基本处于紧缩过程,下调存款准备金是为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二是去年以来的货币紧缩并未改善,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7381亿元,远低于预期中的万亿元大关,外汇占款连续三个月下降使央行有了下调存款准备金的空间。

央票与存款准备金是央行调控货币数量的主要手段。中国没有债券市场控制利率市场,在利率市场化传导机制建立之前,央票与存款准备金是目前央行最直接、最有效的调控手段。如果银行间拆借利率出现大幅度飙升,央行将通过减少央票发行或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向市场释放更多的资金;相反,当银行间拆借利率急剧下降时,可以肯定央票的发行将会增加。

下调存款准备金毫无疑问是货币宽松的表现。由于基础货币发行与存款准备金密切相关,因此,此次下调50个基点,不仅可以即时缓解银行资金压力,更可以在未来释放出更多的基础货币。

此次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并不说明货币政策进入全面宽松通道,希望央行大幅放松货币的人,注定会失望。存款准备金率最大的特点是灵活,看央行是紧缩还是放松货币,要看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后市场的利率反应以及央票的发行利率是高还是低。此次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的背景,是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利率大幅上升,央行停止央票发行,可以想见,如果银行间拆借利率恢复正常,央行货币政策仍然以稳健为主。

存款准备金率可上可下,是灵活的工具,由于在上个周期央行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为本轮周期提供了巨大的下调空间。此次下调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仍然高达20.5%,如果到13.5%左右的中位数,还有7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即14次50个基点的下调。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除非全球再次发生经济崩溃,因为目前通胀压力较大。

央行不会轻易动用利率工具,利率上下两难;提高利率将吸引热钱抑制经济,目前嗷嗷待哺的借贷者如央企、地方投融资公司日子会更加难过;降低利率不会增加更多资金,反而会为通胀火上加油。

上调或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会对证券、房地产市场产生显著影响。从以前的经验看,市场会根据此前的通道运作,存款准备金的短期变化对市场影响不大,并且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增加的4000亿元资金,实体经济都不够分配。但目前的证券市场将因此打上心理强心针,因为目前正处于多空双方来回博弈的胶着期,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给投资者巨大的心理安慰。不必真金白银付出,多头会接过令旗,将“货币鸡汤”当做大利好。可惜,这样的心理暗示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叶檀

近日,据北京相关负责人透露,居住证政策有望在今年出台,以取代目前采用的暂住证。届时,流动人口可凭借居住证享受相关公共服务。

改变权力主导的城市化格局

北京就实施居住证的探索始于2009年,只是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该政策能否于今年切实落地,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动作。居住证背后隐含的公共福利与可以预期的财政“负担”仍然是决定政策实施的最大阻力。事实上,即便在落实与否诸多存疑的当下,已经有人开始担心,一旦政策落实,更多人涌入北京,城市何以承载。

并不是只有北京在尝试践行居住证制度上左右为难,国内许多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种困扰。虽然不少城市已经施行居住证制度,但具体措施和“市民化”程度因地而异。准确地说,城市拥有的资源愈丰富,提供的公共服务愈健全,其推行居住证制度的难度也愈大,一如北京的“徘徊”。

然而,以“北上广”为代表的城市,对人口流入设置了诸多或明或暗的门槛,这些地方仍然是许多人流动和迁徙的首选地。这一现象可能比居住证本身更值得关注和思考。

人们多往这些地方流动,无非是因为这些城市的机会更多,资源更优质,个人实现自我、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更多。人口流动和迁徙应该是自由的,但从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轨迹来看,人口流动方向趋同,大致是以西至东的单向输出,这一点在春运时看得再清楚不过。

向富裕地区或曰发达地区的流动,是基于个人追逐更好生活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资源高度集中让那些有更多憧憬的人趋之若鹜,哪怕内心有多么不愿意背井离乡。“北上广深”几近梦想代名词,无论是什么人,好像只有去了那里,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那么,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是如何集中到这些少数地方的呢?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中国大城市的形式并不全然取决于城市自身的发展,或者与此相应的资源市场配置。在中国,一个城市的发展兴衰,往往有着雄厚的权力印记。也就是说,那些成为权力中心,或者是权力意图所在的地方,资源就在这些地方高度集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具体而言,有的地方可以集金融、贸易、交通、文化、科研等优势于一体,有的地方甚至无法找到发展的着力点,既有资源也可能被拿到别的地方去,服务某些地区的优先发展所需。

客观地说,一些城市发展得更好,不同历史原因,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力主导确实存在。中心城市竞相跻身进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无不是希望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权力主导的城市化,让一些城市显得更加繁荣,更有活力,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许多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可能正在丧失活力,城市化转型非常艰难。

“居住证之困”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从长远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城市或几个地区的,城市或地区均衡发展的前提,应该是改变行政权力主导的状况。

小为

阳光透明 反腐倡廉的“春天里”

新的一年,万象更新。网民们欣喜地看到,2月19日,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是总结与展望,是新的谋划,更是面对新挑战的新举措。反腐倡廉正在走进“春天里”。

反腐工作报告给力,清新之气让人倍感振奋。纵观报告全文,可谓高屋建瓴、求真务实,让人倍感振奋。报告全面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新成效新经验,科学分析了当前反腐倡廉形势,明确提出了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突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总体要求、工作重点,为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切与时俱进,清新之气让人倍感亲切。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在京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1年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及纪检监察

监察查办案件工作情况,不仅公布了立案、结案和处分的数据,还公布了一些群众普遍关心的大案、要案进展情况。而在网上公布的贺国强同志所作的全会报告更是直面了当前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中央纪委采取一系列举措,主动与网民沟通、互动,不回避敏感问题,直面社会热点问题,摘下神秘的面纱,一下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让人倍感亲切。

反腐倡廉阳光透明,清新之气让人倍感欣慰。今年1月16日,中央纪委有关部门领导作客人民网,专门就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进行解读,解答网民提问,在网上引来热议和喝

彩之声。让阳光照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依靠群众参与,更好地推进整个反腐工作。这一点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无论是顺应民众呼声,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反腐工作都应该雷厉风行、大张旗鼓。而将全会报告全文刊登上网更是一个双赢的举措,既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央反腐的决心和信心,保障和落实群众的知情权,也为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反腐行动中来了提供了契机。

我国的反腐工作日趋透明,力度不断加大,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支持,而这必将对于我国反腐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

旭日

“逸夫小学”为何变脸成“4S店”

由香港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捐款,陕西渭南市交通局、渭南高新区白杨办事处赵村村委会共同筹资190.60万元兴建的“赵村逸夫小学”,于2009年年底建成。然而,学生上课仅两周,赵村村委会便以学生上学不方便、存在安全问题等理由,将学校出租给了陕西渭南威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逸夫小学变成了汽车4S店,80多名小学生被迫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里上学至今,多年来,村民多次上访反映无果。(2月19日《中国青年报》)王铎绘



便、“存在安全问题”,云云。试问,既然“上学不方便”,为何当初不把学校选在让学生方便的地方?学校刚刚建成便“存在安全问题”,是不是要追究某些人员的责任?刚刚建成的高楼大厦不安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就安全了?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是每个家长、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共同心愿。如今,现成

的楼房变成了4S店,孩子们被迫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里学习,此中的利与弊、轻与重、得与失,不言而喻!

但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能从全局高度和长远利益出发,自觉纠正那些追名逐利的短视行为,切切实实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负责、未来负责,为他们营造安全、优美、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让重教、爱教、护教之风在社会上真正兴起!

安强

以前听说女性丰胸需要硅胶之类的胶状物,如今也赶上了“时髦”。近日有媒体报道,天津水产市场出现被人为注射明胶“丰体”的“注射胶虾”,以此来保持个体丰满,增加重量。

“沾上边”就该负起责

民以食为天。“注射胶”一经曝光,立刻成为焦点话题。人们在质疑监管缺位时,一些与食品生产、流通、销售有关的政府部门开始打起了“哈哈”,要么说“不了解情况”,要么说“不归自己管”,“无法检测”云云。而一名女摊贩说:“这种虾5年前就有了,批发来就是这样的。”她称“注射胶”无毒,对人体无害,“吃不死人的,否则早就不让卖了”。

“注射胶”根本不需要检测,肉眼就能分辨。但是,注射胶是从哪里来的,哪一环环节注射的,到底有无危害,注射行为是否涉嫌欺诈等问题,这么长时间为何没有权威部门去追查,值得深思。

不仅在食品领域,教育培训方面也存在“注射胶”现象。据报道,浙江省浦江某“矫正训练中心”自称是对叛逆、网瘾等问题少年进行教育以回归正途的地方,在这里却发生了虐待学生的惨剧,当地的工商、教育部门明确表示“不归自己管”甚至出现了相互推诿现象。政府部门权力划分不清导致的监管缺位,让受伤的孩子以及孩子的父母受到二次伤害的同时,透支的更是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还有比上述事件更荒唐的。长沙多条街道违规乱收停车费引发质疑,而收费的道路通公司负责人竟称连自己归哪一政府部门管都不知道。这些年,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的现象日益减少,但是,社会转型期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监督管理在不少领域仍滞后脱节。有些部门见有利可图时,就第一时间跳出来,而一旦出现问题或者事故时,则急忙“脚底抹油”,生怕惹火上身。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对于一些涉及多部门监管的问题,各地常见的做法是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发文、专项行动整治。这种做法有时可以发挥集束效应,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很难达到治本目的。实现有效治理,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管理权限,理清责任范围,问责有的放矢,若这些内容含糊,“九龙治水”的结果往往导致互相推诿、塞责。

同时也应当看到,管理与执法毕竟不是机械式行为,即使职权配置十分严密,也难免留下监管盲区,在监管衔接不畅或有交叉的地方,更需要严格的制度设计,使“沾边”的部门积极主动地负起责来。有的地方推行“首问责任制”,就是从最先受理群众诉求的单位负起跟进协调相关问题的责任。只有权责明晰了,出现问题才能做到有据可查,有责可纠。

任严

近日,北京东直门簋街一家云南过桥米线店起火。消防车赶赴救火途中,不仅未获社会车辆让行,反遭并线超车。网友将此情景拍摄下来上传网络后,引发广泛热议。(2月19日《新京报》)

堵在消防车前的是失序的公德

从网络舆情来看,民众对此情景甚为愤怒。甚至有网友晒出“德国人如何避让消防车”的视频来比较,直斥那些不避让甚至并线超车的司机素质低下。甚至有网友还“大胆”建言,为消防车、救护车等车辆增加“碾压权”。

所谓“碾压权”,只不过是网友的气话罢了,为治理不文明行为,利用更加不文明甚至违背人性的手段,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很显然,公愤能聚焦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因而,与其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别人,倒不如站在公共参与者的角度去反思文明现状和寻求社会改变,唯有如此,公愤的焦点才不会最终沦为虚无的道德空谈。

个体价值和诉求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但并不意味可以抛下公德和公德私算。社会公德的形成,是基于公民良知和社会共识达成的权利让渡,是民众共同遵循的公共准则。譬如自觉为救护车开辟生命通道,为消防车开辟绿色通道,为警车开辟治安通道,正是基于其承担着对社会治理的特殊使命,才赋予了畅行的道路特权。而事实上,避让这些承担着公共使命的特权车辆,也是法律的要求。

有人说,出现消防车堵在路上的现象,是特权车辆泛滥而造成的“狼来了”的现实演绎。但这样的道德逻辑显然是要不得的,不能因为特权车的出轨和越位,就放弃和改变我们的道德信仰。也许,特权车在使用上,确实存在着制度和他律上的失范,并因此损伤社会公平正义,伤了民众的心。但并不意味,因为某些人私用这种特权,就否定这些特权车辆的价值和使命,怀疑这些车辆的正义性,并以此为借口拒绝避让。

里工

特权车辆确实存在某些被权力滥用的现象,但其价值和使命依旧值得我们去维护。对于其在使用上的失序,只有依靠强化监督和敦促制度完善让其使命更加纯粹,才是最合理的路径。而采取抵制和阻碍的形式,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建立在道德裸奔上的博弈只会让这个社会失去更多。滥用已经让这些特权车辆的使命削弱,如果民众不能主动避让,那么与那些乱用特权车的人又有何区别,同样是在阻止其公共使命的正义实现。

社会公德的养成,从来都不是靠比坏比狠来实现的,而是依靠信仰的笃定和价值观的坚守者来完成。特权车使用性质因某些人的滥用而异变,但并不代表着其使命的终结;老人跌倒,扶助者遭诬陷,并不意味着见义勇为精神的道德使命不复存在。不避让的抵制和不扶助的冷漠,并不会倒逼道德环境因此变好,只会加剧道德沦丧的脚步。

如果对公民生命财产足够敬畏,如果道德和良知足够坚定,也许你会批判那个喊“狼来了”的小孩,但绝不该去做那些因不再信任而见死不救的村民。公德的失序,起于个体和局部的溃烂,却是最终崩溃于整个社会对公义的放弃。不信任权力,并不是不避让消防车的理由;害怕被摔倒的老人诬赖,也不是拒绝伸手的借口。如果因为谎言和欺瞒而放弃坚守的公德和信仰,那么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将得不偿失。

一辆消防车在道路上遭遇的困境,不正是社会文明在道德路上遭遇的困境吗?唯有相信并坚守道德,公共秩序和社会良知才能够最终实现并得以延续。如果因为某些个体和权力造成的不信任而放弃了道德,无疑是在制造更大的道德灾难,是在加剧社会道德体系的溃塌。坚守公德和公义,不能因为疲于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放弃道德和公益把自己变成疯子,或许这才是明智的道德选择。

言平

弱势群体需要制度性关怀

据19日的《北京晨报》报道,安徽省滁州市72岁的环卫工人李显梅,在儿媳离家儿子入狱之后,每天凌晨带着6岁的孙女扫大街,其艰难处境经由媒体1月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最近,老人被保洁公司辞退,这再度成为社会瞩目的热点。滁州市城管局18日回应此事时表示,聘请老人工作是考虑其年事已高,出于人文关怀,政府部门已为李显梅及其孙女办理低保与救济,每月可领取900元救济金,比原来做环卫工人的收入还高。

在遭遇诸多不幸之后,李显梅老人这次是幸运的,这幸运来自政府的关怀。不过,李显梅更应该感

谢的是媒体,如果不是经由媒体曝光,当地政府恐怕也不会“高度重视”、组织多部门“联合办公”,给予李显梅人文关怀。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李显梅老人不幸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但同时,其遭遇更有着弱势群体所共有的特性,即因为缺少话语权,所以处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于是个人要想让政府与社会关注,只能是一靠闹二靠炒。所谓“闹”,亦即制造极端事件,比如一直撒泼耍赖的跳楼秀就是一例;而“炒”,指的是媒体的关注。可毕竟,能露出面子以“闹”博得关注的毕竟还是少数,也不是每个需要扶助者都能被媒体发现从而传达其

窘境,一旦报纸电视网络从未顾及,这些艰难活着的人们就无法得到社会及时救助。所以,透过李显梅老人的遭遇,我们应该检讨社会救助体系并认真考虑加以完善。

当然,具体到李显梅老人,因为其户口挂靠亲戚家,本人尚没有身份证,而儿子和儿媳没有领结婚证,所以孩子至今没有户口,所有这些,给当地政府救助带来了诸多难度。但是,要是没有媒体的关注,李显梅恐怕永远难以赢得当地政府的“联合办公”。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需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但也许,我们更需要有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

私德考核能否让官员光明磊落

德考是个好东西,是干部言与行的重要导向。这里的关键在于,考核体系与标准是否科学与贴近实际。

在四川彭山县的干部道德考核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他妻子说知道考察组是来考察丈夫的,但不知道不做家务要被扣分。设想一下,如果干部的配偶父母都知道评分标准,除非干部与家人关系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谁还会如实回答呢?

因而在官员的德考中,这种私德之考,更多的只有象征意义和价值宣示作用,在实际运行中很难有效规约干部的家庭美德。然而,作为一项制度性设计,把私德纳入官员德考确有其必要性。

在官德的考核中,私德往往是一个空白。有的官员长期二奶,有的官员对老父母不闻不问,还有的官员8小时以外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凡此种种,这些私德的恶行百姓见得到,反响也很强烈,但干部管理机构却基本没招。以致公众常有议论,提拔这样的干部,到底奉行的是什么标准,是不是走了眼?

在这个意义上,把私德纳入官德之考,即是从制度上消除干部的隐秘空间,让人一览无余。彭山的官德考核,即是把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四个层面的道德纳入,分别按30、28、28、14分的分值进行考评。而在另一些地方,“孝敬父母”、“忠于配偶”等也被纳入干部考核内容。中央则早已将“健康生活情趣”列为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当官员没有放纵道德的隐身栖居之地,连私德这块最后的堡垒也被捣毁之后,官员之德就有可能“触底反弹”,尽可能地变得“光明磊落”一些,经得起各方面的拷问与晾晒。

与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干部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尤其是党的干部更承载着使命、宗旨、党性

等特殊要求,因而对干部的管理绝不能局限于8小时之内,而是要尽可能地延伸到干部活动的各领域、全天候。如此也才能与社会公众的反应相衔接,对那些恶德恶行的干部绳之以纪。对那些生活作风腐化的官员,“我是领导我怕谁”式的雷人官员严肃处理,也才能对党的干部形象进行制度上的捍卫。

德考是个好东西,是干部言与行的重要导向。这里的关键在于,考核体系与标准是否科学与贴近实际。如前所述,私德考核不可避免会遭遇“为亲者讳”的难题。就是政德、公德、职业道德,也同样有诸多障碍。从各地的一些实践中,其更应当在科学性方面多做探索与优化,使其产生实际效果而不是流于一种形式。如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才能更好地运用,干部也才可能更多地走向光明磊落。

吴乔